

综述：胡帅班底，别具一格

胡匪出身的张作霖，自 1902 年为官府收抚后，一路攀升，自巡防营统领、师长、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及至安国军总司令、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由割据一方的“东北王”、“满蒙王”，最后登上北洋政府末代元首的宝座。当年的不逞之徒，“居然窃据神器”，这多少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这个传奇故事的发生，从大的时代背景上说，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中央政府权力极度萎缩、政局动荡不安、枭雄乘机割地称雄有关。从地理位置上说，东北三省自成一体，是一块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山海关将关内关外截然隔开，只要扼守住了山海关，就可以截断关内外的联系。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为什么独是张作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崛起称雄？这就与张作霖的个人才干，包括他选人、用人方面的本领有很大关系。张作霖用人的特点是：不分畛域，唯才是举；礼贤下士，尊重文人；气度恢宏，有容人之量；不究既往，不搞株连等。这是张作霖能够将三山五岳、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收罗到他的幕府，并死心塌地为他效劳的原因。下面分别叙述张作霖的生平及其幕府成员状况、特点，以及张作霖以什么手段驾驭他那个庞大的幕府成员。

（一）胡匪·东北王·大元帅

草莽英雄到中将领长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生于奉天省海城县西小洼村。祖籍直隶（今河北省）大城，道光初年其曾祖张永贵出关谋生，落户海城。张作霖的父亲张有财，先娶邵氏为妻生下一女，邵氏死后张有财又娶王氏，生下三子，长子作泰、次子作孚、三子作霖。张有财不事农业生产，开设小杂货铺，兼设赌局抽红谋生，是个有名的赌棍。在张作霖14岁那年，张有财与栾家堡子的一个王姓赌徒赌钱，姓王的赌输了，无钱还赌债，张有财戏言要以他的老婆抵债，姓王的赌徒信以为真，衔恨在心。一次，在张有财回家途经一片小树林时，伏候在此的王姓赌徒趁张有财不备将其打死。张作霖的母亲王氏见丈夫久出不归，四处寻觅，后在其家看门狗的引导下才找到尸首，将其埋在乱坟堆中。王氏孤儿寡母无钱请县衙缉凶，这桩命案就不了了之。

张有财死后，张家母子5人生计无法维持，王氏只有将三间住房变卖，携带子女，投奔黑山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的娘家。张作霖因家贫无法上学，后经人说情，给本村私塾先生做饭，顺便念书，不收学费。但张作霖生性顽皮，不受拘束，私塾先生因张作霖不守规矩，时常加以责备，惹起张作霖的不耐烦，一怒之下竟动手打了私塾先生，还扬言：“干啥都吃饭，我不念了。”张作霖失学后，先后卖过面包，做过小货郎，学过木匠、兽医，在此期间学会了赌博并且成为终身嗜好。在做兽医期间，又因给土匪治马，结交了不少绿林中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作霖投入毅军马三元部当兵，因功升为哨长、戈什。后来，在毅军移防关内时，张作霖携械潜逃，开小差回到小黑山。回家以后，张作霖因为有过当兵的资本，遂自吹自擂，自抬身价。赵家庙地主赵占元以为张作霖有出息，便

把次女许配给他为妻。张作霖结婚后搬到岳家，做了倒插门的女婿。但张作霖本性难改，不务正业，一有钱就到赌局鬼混。日子长了，引起岳父母的焦虑，劝他谋个正当职业。后来，在岳父的资助下，张作霖到营口大高坎镇开设兽医桩子，干了一段时间，又嫌做兽医来钱少，甩手不干了，便学他父亲，以赌博和放赌为生。有一次，张作霖赌输了，无钱还债，一群无赖向张索债，扬言要扒掉张作霖的衣裳，活活冻死他。在赌徒们的逼迫下，张作霖冒着东北大地的刺骨寒风落荒而逃，幸遇好心的豆腐店主钟三，脱下其身上的羊皮背心给张作霖御寒。赌徒们发现后，逼迫钟三索回他的皮背心，钟三骑驴追上张作霖后，产生了怜悯之心，不但未索回皮背心，而且以当天所卖的豆腐钱及所骑的瘦驴相赠，让张逃命。张作霖发迹后，不忘钟三当年的恩情，将其请到奉天省城奉为上宾，后来，钟三又随张作霖进了北京中南海的“大元帅府”。这是后话。

张作霖的二哥张作孚也是一个有名的赌徒，张作霖回家后，又与二哥混迹赌场。当时，赌场中常有土匪参与，张作霖兄弟与这批土匪早已相识。有一次，张作孚在赌场与人闹翻，二道沟子村李老恒到广宁县衙门告发张作霖兄弟通匪，张作霖兄弟因此为县“捕盗营”以通匪的罪名抓去投入大牢。后经张作霖岳父多方设法，始以“查无实据”为由释放。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后，有一年到赵家庙，李老恒闻讯后，害怕张作霖翻起旧帐，自己生命不保，便带着老伴到张作霖的行辕请罪。张一笑置之，并说：“我张作霖向来不记仇恨，你虽然告过我，但并未把我怎么样，反而使我发奋向上，才有了今天。”张作霖还命人给李老恒 200 元钱，对他们说：“你们老俩口不要害怕，好好回家过日子去吧。”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张作霖为人的另一面。

出狱后的张作霖仍不务正业，赌钱如故，终日与地方无赖、“绿林好汉”为伍。一次，赌输后的张作霖，去村中偷猪变卖以偿赌债，被当场抓获。由于在村中无地自容，抬不起头，走投无路的

张作霖终于走上了为匪之路。1897年春，张作霖投奔辽西巨匪冯德麟，冯介绍张加入广宁县的董大虎匪帮，当了一名看守“人质”的小头目。张作霖本人也参加过一次绑票的勾当，但他觉得干这种绑票的勾当不是长远之计，于是，干了一年后就脱离了董大虎匪帮。

当时辽西一带，在连续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沙皇俄国入侵两次大的战乱之后，清政府在这里的统治趋于瓦解，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到处滋扰，地方绅商则组织团练，护卫家产。一时间，“保险队”“民团”等组织遍地出现。1898年，张作霖在其岳父的资助下，纠集汤玉麟、宋老丰、崔大楞、齐大有、赵明德、郑殿有、栾老疙瘩等30多人，成立了一支“保险队”，自任小头目，移驻北镇县中安堡镇。约定“保险队”为这一带地方保险，老百姓按土地多少纳饷，养活“保险队”。在保险区以外，保险队则可以抢劫。原来在中安堡镇一带，已有一个以金寿山为头目的联庄会，张作霖的“保险队”成立后，等于把金寿山的地盘分去了一部分，从而影响了金寿山的收入。1901年春节，金寿山偷袭了张作霖的“保险队”，张作霖因无准备不敌，不得不离开中安堡镇，由孙大虎背着张作霖的大女儿张首芳，汤二虎（汤玉麟的绰号）背着张作霖怀孕在身的妻子撤退，投奔八角台（今台安县）的张景惠。张景惠是八角台的“保险队”的头目，二张一见如故，越来越投机。张景惠鉴于张作霖人很聪明，性格豪爽，遇事机智而且勇敢，自己远远不如，执意推张作霖充当大头领，自己退居二头领。张作霖口头上虽说“反客为主，不够朋友”，但经过一番谦让后，也就半推半就地当上了八角台的团练长。

1900年，沙皇俄国出兵我国东北，盛京将军增祺及其家眷仓皇出逃辽西。沙俄取消东北原有的军政机构，将其置于侵华俄军的直接监理之下。直到1902年4月8日，中俄在北京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从订约之日起，俄军分三期撤出东三省。条约签

订后，盛京将军增祺重返盛京（今沈阳市），不久，增祺派人到关内接家眷去盛京。得到这一消息后，颇富心机的张作霖设计劫人，以求得到官府的收抚。张作霖对张景惠等人说：“我们长此在绿林中吃黑饭，前途是暗淡的，是毫无出路的。我看不如借我们现有的这点实力作本钱，向官家讨价，弃暗投明，总比这样继续干下去有些出路。”张景惠等人听了，连忙表示：“只要当家的（匪中黑话，即首领之意）有好办法，打定主意，我们无不唯命是听。”张作霖接着说：“只要大家愿意，我自有道理，不过在未实现以前，必须严守秘密，如果泄露出去，不但事情要失败，而且更要被绿林朋友耻笑。”张作霖将增祺从关内接着去盛京的情报告告诉大家后说：“现在火车只通到沟帮子，这就是我们的大好机会，将增的眷属从此经过，我们要连人带物都给劫下来，但不准乱动，到时听我的命令行事，关于这一点必须同众弟兄讲清楚，违者就要以手枪相见。”

不久，增祺的老婆和随护人员乘着十几辆马车行至新立屯附近一条荒僻路径，被张作霖早已埋伏的匪众拦截住，将大小官弁所携带的枪械子弹以及数十件箱柜全都劫了下来，连人带物一并押解到新立屯街上。他们把掳来的人员车马都安顿停当，单给增的老婆和她的贴身侍者安置在一座很好的房舍里，并用最好的鸦片烟款待增的老婆和随行人员。这些人看到这帮土匪非常温和，很容易接近，心中有些莫名其妙。张作霖又亲自招待随行的几个重要人员躺在床上吸鸦片烟，还表现出唉声叹气的样子。并说：“咳，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如此的软弱，毫无国际地位，受尽了外人的欺凌，国内人民生活竟达到这般境地，真使我有说不出的伤痛！我们所以当上土匪，也是被逼上了梁山哪！”增太太的随行人员看到张谈吐如此文雅和满腹牢骚的情景，料定其中必有文章，其中一个比较有地位的人搭讪着说：“我们很同情你的处境，我想我们将军来到奉天一定会有办法的，你们也一定会有出头露面的那一天。”接着又说：“请原谅我不懂规矩，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我要大胆请问您贵姓。”

张答说：“我就是张作霖。”这几个人一听是张作霖，一时都很愕然。这些人过去听说张作霖是奉天著名的一个匪首，生得身魁力大，面貌凶恶，今天真个见了面，却是这样一个廿六、七岁白面书生般的青年，暗中觉得有些诧异。张作霖接着就把自己的身世和为什么会走上绿林这条路的前因后果，很坦率地说出来了，言下流露出一股愤懑不平之意，对奉天将军增祺故意特别表示怨恨。说增到任不久，不弄清真假虚实，就要严拿法办，使我们有口难辨，不过我们干这个勾当，个人的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了！那个随员接着说：“依我之愚见，长此同官家作对，毕竟是没有好处的，为了个人的前途，我看你们弃暗投明，才是正路。”随后问张：“假如有这样的机会，尊意如何呢？”张回答说：“我已说过了，我们是万不得已才当上土匪的，假如能得到机会为国家效命是正合我们的心愿的。不过听说增将军这个人很固执，我们现在还很难使他改变态度。”张接着又问：“你们究竟是那一部分的呢？那位太太又是谁呢？请放心，我们保证不会加害你们的。”带头的那个人思索片刻说：“待我回禀太太一声，取得她的吩咐再同你们谈。”这位随员立即去见增太太，把和张作霖的谈话经过述说一遍。增太太当时考虑，一来为了解除眼前急难，二来为了替增祺去一地方治安的大患，论公论私都应见张一面。她和随行人员商议决定之后，准备与张一见。张入室行了个大礼参拜，低首站立着说：“张作霖冒犯夫人，愿听吩咐。”增太太看张对自己很恭敬，也很谦逊，就对他说：“我明白告诉你吧，我就是增将军的夫人。我们这次是由京城来到奉天，路过此地。我原在省城时，就听说绿林各帮与增将军为难，特别是你的声名最大。现在路上巧逢，想不到你这样对待我们。适才听到随行人员报告关于你过去的一切和你的愿望，我很同情你，我看你是一个很有为的青年，而且又有这样的一部分力量，假如你能很快地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前途一定是不可限量的，我想你一定会愿意这样作吧！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达奉天，我也一定保证向增将军

建议收编你们这一部分力量为奉天地方效劳，既有利于地方治安，你们也有了出路。”随即问张：“你看这样做好吧？”张立即称谢，并说：“假使我张作霖能带众弟兄投到增将军麾下，为国家效命，有生之日，决不能忘掉增太太的大恩。”随即辞出与张景惠等说明，并命令匪众把所劫的东西连同枪械子弹照数交还随行人员查点清楚，寸草未动。增太太和随行人员更大受感动，并拿出五锭纹银赏给张的部众。张婉言谢绝说：“只要有出头露面的一天，那就殁世难忘了。”增太太一行人等随即离开新立屯，平安回到奉天。

增太太到达奉天后，立即把途中遇险和张作霖诚心弃暗投明的愿望说与增祺，并且把张作霖的实力和他的为人以及她本人对张的看法，详细向丈夫叙说了一遍。增祺大为动容。此时增祺正在考虑“化私团为公团”，遂命新民府知府增韫相机招抚张作霖。与此同时，张作霖也委托陶允恭、张紫云等串连地方绅商各界具保向新民知府推荐，吹捧张作霖“能充分胜任地方治安工作”。1902年11月间，张作霖接受收抚，所部“保险队”改编为省巡防营。当张作霖到盛京“谢委”时，盛京将军署总参议问他为什么想受抚时，张作霖直言不讳地回答：“我想升官发财。”

张作霖受抚后，所部移驻新民，参与剿匪。张作霖对剿匪特别卖力，所部也在剿匪中逐渐扩大。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废除特殊的将军制，建立行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同年7月，张作霖奉徐世昌之命，设计诱杀了辽西巨流杜立三，为地方除去一大害。徐世昌立即上奏清廷为张作霖请奖，声称：“杜立三、田玉本等以积年巨匪，屡与官军接仗，恶贯满盈，久为地方之害。今兵不血刃，渠魁授首，不但辽西安枕，即他处匪徒，亦闻而知惧。该统领等赴机迅速，实为异常出力，奋勇可嘉，应准其择优保奖，以昭激励。”（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四，军事军政篇，第145页）清廷谕准：“予都司张作霖等五员奖叙”，并赏银2000两。随后，张作霖升任奉天巡防队统带（团长）。

1908年，张作霖部调到郑家屯、洮南剿击为沙俄收买的陶克陶胡叛匪，张部由5营扩充为7营，达到3500人。经过近两年的艰苦作战，张作霖部与其它部队一起赢得了胜利，击毙叛匪大将白音大赉，将陶克陶胡逐出内蒙地区，逃入沙俄境内。

1911年5月，赵尔巽出任东三省总督，在奉天省城设立讲武堂，轮流培训中下级军官，张作霖将其绿林老伙伴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都送到讲武堂受训。当张景惠等从洮南动身时，张作霖叮嘱他们随时将省城政情变化写信告诉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东北革命党人也跃跃欲试。赵尔巽惶恐不安之际，其心腹谋士袁金凯等建议，急调张作霖部进驻奉天城。张作霖进驻奉天后，强行宣布成立以赵尔巽为会长的奉天国民保安会，张作霖任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控制了省城局势。随后，张作霖指使汤玉麟等部下疯狂屠杀革命党人，声称“杀秃子”（革命党人已剃去辫子），前后被杀的革命党人多达三、四百人，将奉天省城变成了一座白色恐怖笼罩的鬼城。

张作霖之流的倒行逆施，虽然未能挽救清王朝的覆灭，却由此赢得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激赏。1912年9月，赵尔巽报请北京政府陆军部批准，将奉天省巡防队改编为两个陆军师，即第27师和第28师，赵尔巽经报请袁世凯批准，由张作霖和冯德麟分任27师和28师师长。这样，张作霖这位胡匪在受抚后的短短10年间跃升为正规军的中将师长。

从“奉天王”到“东北王”

1912年11月，张锡銓继任奉天都督。当时，奉天共有4支武装力量：一是驻奉天省城的第27师；一是驻辽西北镇的第28师；一是驻在洮南的吴俊升的“后路巡防队”；一是驻凤城的马龙潭的“右路巡防队”。吴俊升和马龙潭还分别兼任洮辽镇守使、东边镇守使。在上述4支武装中，以27师和28师实力最强，特别是第27

师进驻省城，更具有政治上的优势。

张作霖重兵在握，实力早已凌驾于奉天将军（由都督改称）张锡奎之上。张作霖的师长官邸成为奉天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一帮趋炎附势之徒争相奔走于张公馆，奉天交涉使于冲汉有什么情报，总是先报告张作霖然后再报告张锡奎，使张锡奎深感大权旁落，不得不以“奉省政务繁多，以老病之身不胜重任”为由，向袁世凯提出辞呈。1915年8月，袁世凯将张锡奎调走，任命另一位亲信段芝贵为奉天将军兼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张作霖对于段芝贵的到来，虽然心中不满，却也不能不暂时容忍，并且对段芝贵“曲为奉承”，甚至“不时搜购珍贵玩物，馈送段父，以买其欢心”，处处显示了一个阴谋家权术家的伎俩。

在袁世凯酝酿复辟帝制时，张作霖起初积极参加劝进，密电袁世凯表忠心：“关内外有异议者，惟作霖一身当之。内省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所部以平内乱，虽刀斧加身，亦不稍怯。”在奉天表决国体投票时，张作霖亲自带了大队人马荷枪实弹监视公民投票，造成清一色的赞成君主的“民意”。1915年10月28日，奉天将军兼巡按使段芝贵密报袁世凯：“奉省今日决定国体投票，计奉省56县，代表56人，开票后，赞成君主立宪，全体一致。各国民代表复全体推戴今大总统袁公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欢声如雷。”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皇帝后，论功行赏，大封王、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等爵位。袁世凯封爵以前清督抚的驻地而高下，大省的上将军授公爵侯爵，小省的将军授伯爵、子爵，巡按使（相当于省长）授男爵，中将阶级的师长镇守使授轻车都尉。张作霖以一中将师长授为二等子爵，在袁看来已是破格笼络，但“抱有封侯大志”的张作霖，却对此大为失望。张作霖问左右：“子之何谓？”左右回答：“子爵下于伯爵一等，再上为公为侯。”张作霖怫然不悦：“吾何能为人作子！”遂立即递呈请假，以示不满，段芝贵亲自上门视疾，张也挡驾不见。袁世凯见张作霖不服，拟调张作霖为绥

远都统，又为张一口拒绝，弄得袁、段皆无可奈何。

12 月底，唐继尧、蔡锷等组织护国军，兴师反对帝制。袁世凯四面楚歌，于 1916 年 2 月间召张作霖入京，要他带兵入湖南与护国军作战，事成后封侯封公都不成问题。张作霖当面拍胸发誓愿为前驱，但将饷械骗到手后，回到奉天又变了卦，让袁世凯这位老枭雄吃了新枭雄的暗亏。这时，唐继尧、任可澄又给袁世凯带来电报，要求袁世凯“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铃、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张作霖见时机已至，即采纳谋士袁金凯的献计，与冯德麟合谋驱逐段芝贵。由冯德麟及其旅长张海鹏扮黑脸，张作霖扮白脸。段芝贵手中无兵，不安于位，微服到北京向洪宪皇帝袁世凯哭诉，袁已是自身难保，更保不了段芝贵。袁世凯不得不于 4 月 17 日以派段芝贵赴前敌劳军为名，将段芝贵调离奉天，而以张作霖署理奉天将军兼署巡按使。对此，陶菊隐指出：“皇帝的威严不能庇护一个宠臣，是新朝的一幕悲剧。”而张作霖却在这幕悲剧中粉墨登场，爬上“奉天王”的宝座。

1916 年 7 月，继任大总统黎元洪下令将各省将军改为督军，巡按使改为省长，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成为“奉天王”后，重用文人治奉，以袁金凯为军政两署秘书长，杨宇霆为督军署参谋长，王树翰为财政厅长，王永江为全省警务处长兼省城警察厅长。张作霖得到这些奉天名士的辅佐赞襄，如虎添翼。

第 28 师师长冯德麟是绿林前辈，又是老亲日派，资格比张作霖老，实力也比张差不了多少。在驱赶段芝贵前，冯德麟说过这样的场面话：“兄弟，你比我精明强干，你当头，哥哥捧你。”张作霖也就老实不客气地说：“如果大哥捧我，我就遵命吧。”但当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兼省长后，冯德麟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不久，张作霖的绿林老伙伴汤玉麟也因不满张作霖重用王永江等文人而与张作霖闹翻，冯德麟乘机支持汤玉麟反张，对张作霖的统治权威构成严重

挑战。为了制服冯、汤二人，张作霖一方面投靠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一方面加紧与日本勾结，向日本表衷心，取得日本政府对他的谅解。张作霖有了这两个强有力的靠山后，于 1917 年 5 月 4 日断然下令免去汤玉麟的第 27 师 53 旅旅长职务，次日，宣布由张景惠接任。冯德麟见段祺瑞与日本均支持张作霖，不得不臣服。不久，张勋复辟发生，张作霖开始采取骑墙态度，观察风向；而冯德麟却与其所部旅长张海鹏亲自进京，为张勋复辟捧场。段祺瑞起兵讨伐张勋，张勋复辟成了昙花一现。此时，段芝贵成了段祺瑞手下红人，段芝贵为了报被冯德麟逼宫的一箭之仇，便在段祺瑞面前竭力主张严办冯德麟，段祺瑞同意。张勋复辟失败后，张海鹏见风声不对，化装从小路绕道热河一带逃回关外，而冯德麟自恃有日本人随行当保镖，谁也不敢动他，所以仍然乘火车包厢大摇大摆地回关外，不料行至天津车站，就为段祺瑞部下陈文运逮捕，成为复辟犯。张作霖乘机将冯德麟手下两位旅长汲金纯和张海鹏拉过来，吞并了冯的第 28 师。1917 年 8 月 2 日，段祺瑞政府宣布，张作霖兼 28 师师长，27 师师长由孙烈臣担任。在冯德麟彻底失去兵权后，张作霖为表示他的宽大以及绿林义气，反过来充好人，电请段祺瑞释放冯德麟。段祺瑞将冯德麟关了一段时间后，便以“冯参加复辟证据不足”为由，仅给以吸食鸦片罪罚金 800 元的处分。从此，冯德麟成了一个无权无勇的光杆，后经人斡旋，投到张作霖门下充当食客。

张作霖在制服冯德麟与汤玉麟后，才真正统一了奉天军政，坐稳了“奉天王”的宝座。1917 年 8 月 15 日，张作霖又通过北京政府，将洮辽镇守使吴俊升所属的奉天后路巡防队与驻奉中央骑兵第 2 旅合并为陆军第 29 师，任命吴俊升为中将师长。至此，张作霖拥有了 3 个正规师，实力大为增强。

张作霖有了实力，即着手兼并吉林、黑龙江两省。鉴于吉林当局实力较强，张作霖首先将手伸向了内部矛盾多、政局动荡的黑龙

江。张作霖利用黑龙江的内部斗争，派孙烈臣率兵进驻黑龙江，并保荐他的同乡和儿女亲家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黑龙江的实力派许兰洲部被强行调到奉天，成为张作霖控制的一部分，而不服的英顺、巴英额则被撤职，黑龙江完全纳入张作霖的势力范围。

张作霖在夺取黑龙江之后，又把手伸向了吉林。吉林督军孟恩远是老资格，张勋复辟时，孟恩远参与筹划，被任命为“吉林巡抚”。张作霖抓住这个把柄，策动吉林籍国会议员向北京政府控告，要求罢免孟恩远。1917年10月18日，段祺瑞政府下令革去孟恩远的吉林督军职务，派察哈尔都统田中玉为吉林将军。田中玉是段祺瑞的亲信、皖系干将，过去在长春驻扎过，与日本人关系“极为良好”。调令发布后，孟恩远立即宣布拒绝服从。张作霖对此也极为矛盾，一方面他想驱孟，取得吉林地盘；但是张作霖更怕亲日的皖系干将田中玉来吉林，迎来一个更强的对手。在张作霖看来，与其让田中玉来吉林，不如让孟恩远再干一段为好。这样，张作霖便暂时放弃驱孟的念头，转而在北京政府与孟恩远之间进行斡旋，北京政府这才允许孟恩远“督任延期”。

在插手吉林碰壁后，张作霖转而入关，参与关内角逐。当时北京政府代总统、直系领袖冯国璋和国务总理、皖系领袖段祺瑞两人面和心不和，勾心斗角，矛盾重重。段祺瑞一派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遭到冯国璋一派的掣肘。为制服冯国璋，段祺瑞的心腹谋士徐树铮亲到奉天拉张作霖入关，支持段的“武力统一”政策，两方一拍即合。张作霖随即动员6个混成旅入关，编成两个支队，参与对南方的作战。9月，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徐树铮以副总统为诱饵，诱使曹锟、张作霖南下作战，谁最卖力南征就把副总统给谁，但终因各方牵制而暂时搁置。张作霖未能取得副总统宝座而大为失望，为安抚张作霖，徐树铮示意北京政府于1918年9月7日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使张作霖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

1918 年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等国为了与日本争夺中国，也反对段祺瑞推行的“武力统一”政策，并策动南北和谈。12月2日，日本也在英美压力下加入“五国劝告和平”。在此背景下，以日本为后台的张作霖也把他伸入关内的势力暂时退回关外。

张作霖退回关外后，在日本帮助下，于 1919 年 7 月以武力制服吉林督军孟恩远，迫使孟去职。根据张作霖的意愿，北京政府调鲍贵卿为吉林督军，以孙烈臣为黑龙江督军。至此，张作霖把整个东北三省纳入了其势力范围，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爬上北京政府末代元首宝座

张作霖当上了“东北王”后，又开始觊觎关内，问鼎中原。

张作霖鉴于皖系掌握的边防军势力进驻蒙古地区，妨碍他向蒙古地区扩张，于是一改过去捆段政策，转而与直系曹錕勾结。1920 年 4 月，张作霖暗中参加了直系军阀策划的八省反皖联盟。6 月 19 日，张作霖又以“调人”姿态进京，表面上在直皖两派间不偏不倚，扬言“在他眼内无所谓直系、皖系”，貌似公允，但实际上处处偏袒直系。在调停失败以后，张作霖决定公开倒向直系一边，7 月 11 日，张作霖在奉天召集吉林督军鲍贵卿、黑龙江督军孙烈臣、以及吴俊升、张海鹏两师长开会，决定由第 27、28 师各出兵 1 旅入关，保护京奉路，以卫队旅之一部协同第 28 师留奉部队，保护关外京奉路。7 月 12 日，张作霖与曹錕联名发表讨皖通电，指责段祺瑞专横谬妄，实为全国之公敌。7 月 14 日，直皖战争打响，入关奉军从侧面掩护直系，并参加了部分战斗，导致皖系彻底失败。

直皖战争结束后，奉军占据了京津地区，奉系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徐世昌成了奉直两系挟持下的傀儡总统。

1921 年 5 月 30 日，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都统。这样，张作霖这个“东北王”头上又加了一顶“蒙疆王”的桂冠。

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两派在分割地盘、组织内阁、任用疆吏等问题上产生了重重矛盾，于 1922 年 4 月 29 日发生了第一次直奉大战，但不到一周，奉军就溃败瓦解，仓皇退回关外，北京政府遂由直系军阀独占。5 月 10 日，北京政府宣布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张作霖虽然丧失了关内地盘，但他在东三省的统治地位却非北京政府一纸命令所能动摇，而且直系也没有力量直捣关外。6 月上旬，东三省议会宣布推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为副总司令，宣布东三省“自治”，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

第一次直奉大战，张作霖认识到他那以绿林班底组建起来的军队素质低下，不堪一击，决心重用新人，彻底整顿奉军。为此，张作霖从各地招聘了一大批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等军事院校及国内各军事院校毕业的、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军官加入到奉军，整顿和编练军队。经过近两年的整军经武，奉军有步兵 27 个旅，骑兵 5 个旅、炮兵 2 个独立旅和 1 个独立团，同时还保留 27 师、29 师，并新编了第 1 师，总兵力 25 万人，另有海、空军。

张作霖有了这支强大武力，决心报仇雪耻。1924 年 9 月 15 日，张作霖宣布自任镇威军总司令，所部编为 6 个军攻击山海关、热河一带的直军，第二次直奉战争于 9 月 17 日爆发。经过整顿后的奉军已面貌一新，战斗力大为提高，奉军无论是总兵力，还是战斗力均超过了直军，加之直军大将冯玉祥、孙岳、胡景翼临阵倒戈，以致直军惨败，残部为奉军收编。靠贿选上台的总统曹锟被冯玉祥囚禁。

1926 年 11 月 10 日，张作霖赶到天津，与冯玉祥商量北京政府问题，决定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1 月 15 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通电公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1 月 24 日，段祺瑞入北京宣誓就职，组织临时政府。

在分赃过程中，张作霖凭着兵多势众，根本不把冯玉祥当做平等合作伙伴，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说：“张作霖那次到天

津住在曹家花园，门口的岗兵，都和义和团似地拿着长枪大刀，枪长二丈，刀长一丈，一对对十数对两边站立，排列成行。那种气派真叫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如此人物怎能与共谋同事！”冯玉祥接着又说：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后，“一批批安福系余孽都连翩入京。瞪着眼珠，急于想在一新政权里分些赃品。局面急转直下，演变至此，糊糊涂涂混下去，岂不是为强盗马贼（指张作霖）当伙计？如此一想，不由的我对新局面万分消极。”奉张咄咄逼人，让人难以忍受。当时，北京还在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之下，于是，在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进京时，岳维峻、邓宝珊这两位国民军将领向冯玉祥请求，将张氏父子捉起来枪决，但冯玉祥担心杀了张氏父子收不了场，极力说服岳维峻、邓宝珊不要蛮干。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后，在张作霖、冯玉祥这两个“婆婆”之间走钢丝，玩弄微妙的平衡术：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让国民军占据京绥线及包括北京在内的京汉线北段；任命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让奉军沿津浦线向长江下游扩张。奉军从 1925 年初大举入关，到 8 月间，已占据了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包括上海），这是奉系军阀的鼎盛时期。

1925 年 10 月 15 日，直系浙江督办孙传芳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誓师讨奉，将进入江苏、安徽境内的奉军一举驱逐，奉军败退山东。接着，手握奉军主力部队的郭松龄又与冯玉祥、李景林联合，于 11 月 22 日宣布起兵反奉，郭军一直打到离奉天省城仅几十公里之遥的巨流河，张作霖虽在日寇的全力支持下打败了郭松龄，但实力严重受损。

张作霖获悉郭松龄反奉与冯玉祥有关时，气得咬牙切齿，发誓要报仇。在日寇的撮合下，张作霖与吴佩孚这两大宿敌“弃嫌修好”联合进攻国民军。1926 年 1 月，张作霖重整奉军，指挥奉军第五次入关作战，奉军、直鲁联军和吴军联合将国民军先后赶出河南、京津地区，国民军退往南口地区。5 月 28 日，张作霖与吴佩

孚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会晤，商讨“反赤”大计。接着，张吴又把山西的阎锡山拉过来，形成北方各派军阀“联合反赤”的局面。随后，奉直鲁晋联合在南口、晋北、热河分数路进攻国民军。国民军不敌，经两个月血战后退往陕甘地区，张作霖重新占领了直隶、热河、察哈尔等省区，并将京津地区置于他控制之下。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总司令蒋介石统率下从两广出师北伐，冯玉祥也从苏联归来重整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首先挺进两湖，一路势如破竹，歼灭吴佩孚的主力，接着，又转进江西战场，重创五省联军孙传芳部。张作霖作为最大的实力派军阀，于1926年11月在天津蔡园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团结北洋派”，对付国民革命军的问题。会议进行过程中，在江西受到重创的孙传芳微服赶到天津，向张作霖请罪并投诚，张作霖喜出望外，当即应允孙传芳投诚。会议决定组织安国军，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孙传芳、张宗昌为副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宣誓就职，成为北洋军阀的盟主。

之后，孙传芳、张宗昌部反攻江南，但遭到惨败；奉军一部进攻包头、五原的冯军，主力则由张学良、韩麟春率领以援助吴佩孚抵抗北伐军为名，相继占领直隶保定、大名，并且长驱南下进入河南，与吴佩孚的残部——河南保卫军作战，经过血战，击溃了河南保卫军。接着，又与进入河南的武汉国民政府派出的北伐军作战。奉军士气低下，不堪一击，被北伐军逐出河南，奉军主力撤退到黄河以北。

面对国民革命军的胜利进军，帝国主义开始从革命营垒内部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他们相中了蒋介石这个顶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桂冠的国民党右派人物。日本外务省交涉局长佐分利积极宣传蒋介石与张作霖间的“妥协点”。日本宣传机构大肆宣传“南北妥协”、“共同反赤”。在此背景下，张作霖发表宣言，声称：“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而专为消灭过激主义；舍过激主义，皆有商量之余

地。”在帝国主义的怂恿下，张作霖与蒋介石一北一南争相向帝国主义献媚争宠。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在南京宣布成立蒋记南京国民政府；4月6日，张作霖不顾国际惯例，非法搜查苏联驻华使馆，逮捕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在内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数十人。4月28日，张作霖残忍地绞杀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

宁汉对立后，蒋介石将打击矛头指向武汉国民政府，而准备与张作霖暂时妥协。6月8日，蒋介石向张作霖提出“议和”条件：要张作霖“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维持东北治安，以实现“南北议和”。蒋介石要张作霖俯首称臣，张作霖心有不甘。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接受孙传芳、张宗昌及奉军将领的推戴，宣布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同时任命潘复为国务总理。当天公布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规定：

第一条：陆海军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

第二条：大元帅于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保障全国人民法律上应享有之权利。

第三条：军政府政务员，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

第四条：国务员之员数左：国务总理、外交总长、军事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实业总长、农工总长、交通总长。

第五条：大元帅之命令，国务总理须副置之，其关于各主管部务者，各部总长须连带副署。惟任免国务员，不在此例。

张作霖凯觐大总统宝座多年，但他这个胡匪出身的人要做国家元首，捧场的不多，张作霖也有自知之明。为了急于与蒋介石取得对等谈判地位，张作霖不得不变通名目，称“陆海军元帅”而不称